



# 李春熠 我是天津人,我爱说相声

记者 何玉新

第五届“马季杯”全国大学生相声展演于今年4月在宝坻区拉开序幕,并将持续至9月。自2017年创办,“马季杯”已走过八年历程,获得首届冠军的李春熠,如今已是全国知名的青年相声、快板演员。

李春熠在天津出生、长大,自幼喜欢相声,到北京上大学,经常参加京城高校相声联盟的演出,并加盟听云轩,逐渐积累了演出经验。2023年5月,他在师父曹云金的直播间唱快板,凭着娴熟的技巧、火爆脆快的风格赢得了观众的认可。那场直播有35万人观看,2亿点赞,让李春熠一举成名。

## 年幼时痴迷相声 逃课去相声园子

童年时,李春熠家和平区电报大楼附近的众诚里。爷爷是天津总医院的医生,喜欢相声,爱买相声磁带,马三立、侯宝林、马志明、李伯祥,录音机里天天播放。李春熠听着相声长大,天津相声广播、天津电视台《每日笑吧》节目都是他的最爱。

在和平区中心小学上二年级时,六一联欢会,李春熠第一次当众说相声,演了一段《反正话》。回忆那次表演,他最深的印象是:“不紧张,没有磕巴、忘词儿。”

老师发现这小孩有点儿懂相声,了解情况后,为了鼓励他,让他把爷爷的相声磁带拿来,午休时给同学们播放。大家听着笑成一片。播完后,李春熠就讲,这两位演员是谁,他们还有什么其他的作品。坚持了一个学期,同学们一见他就乐,把他跟相声“绑”得特别牢。

2001年12月,马三立先生从艺八十周年暨告别舞台晚会在贵州路天津市人民体育馆举办。爷爷单位发了两张票,因为在后排,李春熠还带了个望远镜。他深深记得,马三立先生走上舞台,说了这么三个字儿:“我值吗?”现场所有人都喊:“值!”李春熠旁边儿坐着一位老爷爷,掏出手绢儿擦眼泪,“当时对我幼小的心灵有特别大的冲击,我就想,相声演员好棒啊,能这么让人喜爱。”

“那阵儿我干过最疯狂的一件小事,就是跟我爸妈说,我想学英语,想买一台步步高学习机。买回来之后,听了几遍,把英语磁带给抹了,拿它录相声广播里的相声。”李春熠说,那些磁带他现在还留着呢。

爸爸常骑车带着李春熠去古文化街,走到名流茶馆,就买票进去听听。古文化街上有个小摊儿卖快板,就是几块竹片子用鞋带系上那种。爸爸给他买了一副,把他高兴坏了,拿着快板打了一路。

这时李春熠才知道,爸爸小时候是学校的文艺骨干,差点儿被杂技团选走,爷爷不舍得,没让去。爸爸教他打快板,而且是反手板,“我现在的反手板就得益于我爸爸。”

其实李春熠属于那种比较安静的小孩儿,没事儿爱画画,一边听相声,一边画。考入和平艺术中学后,爸爸又把他送到南开区少年宫学美术。但是,李春熠发现自己还是喜欢相声,“我要不听相声,感觉画不出来。”每次到少年宫,他先画一幅画,然后跟老师说要上卫生间,出教室后,骑着自行车就跑了。到名流茶馆,拿零花钱买张票,进去听一会儿。估摸差

不多快下课了,又跑回去。

李春熠对曲艺越来越痴迷,自己在家背贯口、练快板。姥爷认识当时天津市曲艺团相声队的队长刘西雨先生,便把李春熠送到刘先生那儿学快板。“刘先生是我的启蒙老师,我跟他学了《三打白骨精》。”后来,他又跟王派快板名家张金铭先生学了《玲珑塔》。“张先生家住北辰区一个小区的六楼,我记得去他家里,张先生也控制不住情绪,捂着脸哭起来。事后,郭鸿斌还开玩笑说,我以为是哪儿过火车呢!

李春熠说:“参加大型比赛,可以提升自己的业务能力、控场能力,积累上大舞台的经验。”他记得,比赛后面有一个访谈环节,他提出了“泛大学化相声”的理念。“比如说,在北京师范大学表演,说那里的食堂或者其他有特色的东西,就会有效果,但把这个包袱儿,这个框架,这个小故事放到北京工业大学,观众就不明白。‘泛大学化相声’的意思就是,创作一些凡是上过大学的人都能听懂的包袱儿,让他们会心一笑,那么就达到了效果了。”

再往后,李春熠又练了高派的《同仁堂》,没有老师教,就是纯听录音,跟着学。“至今我也没有一个快板的师父,但是我特别感谢教过我的老先生们。”李春熠说。

## 加盟听云轩剧场 首届“马季杯”夺魁

上中学时,学校里每年年底办联欢会。初中一年级,李春熠演的第一个节目是《论梦》。上初二时,演的节目是《报菜名》。到了初三,他有了新搭档,叫李大宇,是比他低一年级的学弟,两人演了《对坐鼠来宝》。现在李大宇在黑龙江省曲艺团,是刘彤老师的高足。

上了高中,学校已经“圈不住”李春熠了。他常去各个小园子玩,偶尔也上台表演一段。他还在和平文化宫组织过相声演出。有一件事回想起来特别有意思,白天,他坐课堂听老师上课,到晚上了,老师买票去听他说相声。“那位老师特别年轻,课间时问我,春熠,晚上给我留个好座儿啊,我带我女朋友去。”

有一段时间,李春熠还在两岸相声会馆演过。跟他同批演出的,有现在特别火的葫芦相声社的三位演员——“乐呵兄弟”张峰岩、张斌,还有朱明鑫,有马六甲的徒弟郝梦春,还有赵魁然、康建翊,攒底的是裘英俊和于丹。“能跟这些演员一块儿演出,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提升。”

爸爸想让李春熠考天津艺术职业学院,但李春熠觉得自己毕竟是学美术的,成绩还可以,应该能考上一所本科院校。他决定好好准备高考,当然还是离不开相声,学习压力大,靠听相声解压,包括马三立先生、刘宝瑞先生、马季先生的相声,天天听。最终高考成绩还比较理想,他考入北京化工大学广告设计专业。

到北京后,他参加了在中国矿业大学举办的首都高校相声短剧比赛,拿了第一名,何云伟、李菁是那次比赛的评委。上大二时,2013年6月1日,他到北京林业大学演出,曹云金是最后的底角。曹云金很欣赏李春熠的表演,对他说:“听云轩马上要开剧场了,在金台夕照会馆,有时间过来玩。”不久后,李春熠成为听云轩的一员,正式开启了一段相声之旅。

曹云金根据李春熠的特点给他找了搭档郭鸿斌。2013年,这对搭档在正式场合表演了第一个节目《打灯谜》。2014年,两人走上荧屏,在北京电视台录制了《八零九零说相声》节目。2017年,李春熠大学即将毕业的时候,和郭鸿斌一起参加了首届“马季杯”大学生相声比赛。他们拿出了两段作品——已经创作了很长时间、演过很多次的《梦想清单》和创作了两个多月、演了两三场的《无名指的忧伤》。复

赛时,《无名指的忧伤》是第一名,《梦想清单》名次靠后。到了决赛现场,《梦想清单》的演出效果特别好,姜昆、王谦祥、李增瑞、刘俊杰等评委,都被他俩的表演逗得开怀大笑。

清华大学的一对演员得分99.6分,大家都以为不容易超越了。结果,李春熠和郭鸿斌的最后得分达到了99.8分,获得一等奖。回到后台,李春熠再也控制不住情绪,捂着脸哭起来。事后,郭鸿斌还开玩笑说,我以为是哪儿过火车呢!

李春熠说:“参加大型比赛,可以提升自己的业务能力、控场能力,积累上大舞台的经验。”他记得,比赛后面有一个访谈环节,他提出了“泛大学化相声”的理念。“比如说,在北京师范大学表演,说那里的食堂或者其他有特色的东西,就会有效果,但把这个包袱儿,这个框架,这个小故事放到北京工业大学,观众就不明白。‘泛大学化相声’的意思就是,创作一些凡是上过大学的人都能听懂的包袱儿,让他们会心一笑,那么就达到了效果了。”

作为“马季杯”大学生相声比赛的倡导者、推动者之一,姜昆先生将这些从比赛中脱颖而出的演员视为财富。他给李春熠和郭鸿斌提供了很多演出机会,包括参加天津卫视《笑礼相迎》节目,他俩还和姜昆先生一起在节目中表演了相声。

## 入职煤矿文工团 创作永远不会停

2019年,中国煤矿文工团招聘演员,老团长贾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李春熠和郭鸿斌。他们一直在听云轩剧场演出,也参加过相声比赛,凭着丰富的表演和创作经验,在招聘中脱颖而出,正式加入中国煤矿文工团。

进团后,他俩的第一场演出是去山西朔州慰问煤矿工人。李春熠说,在文工团演出和在小剧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小剧场演员和观众互动多,大舞台也有互动,但更注重主题性、思想性,但包袱儿绝不能弱,笑点还得更密集,对演员来讲,要求更高了。

前一段时间,煤矿文工团去鄂尔多斯下矿演出。那天演完之后,来了一个矿工师傅,跟李春熠他们合影,请他们签名,并告诉他们:“我在网上看过你们的直播,我闺女、我儿子原先没听过快板,听完你们的快板和相声,包括曹云金老师的相声,特别喜欢,成了你们的‘粉丝’。我经常上夜班,没时间去剧场,你们能来到我们的工作岗位,给我们带来欢笑,我特别感动。”他的这番话让李春熠特别感动。

文工团请王谦祥先生做讲座。王先生有一句话,李春熠一直记在心里头:“能耐压着名气,你一辈子都会很踏实;如果名气压着能耐,可就坏了。”当直播、短视频火了之后,李春熠知道,自己更要加倍努力,不断地出新节目,才能持续火下去。

如今,李春熠自己有一个小的创作团队,七八个人,创作方式很特别,时不时开一次“围炉会”,提出一个点子,大家分工——有人写人物,有人写故事、剧情,有人写包袱儿,有人想立意是什么,还有人负责记录、整理。李春熠说:“有点儿像好莱坞创作电影的方式,大家在一块儿碰撞出火花。我们的很多新节目都是这个小团队创作出来的。”

他想提升作品质量,“我的目标是上央视春



李春熠(左)、郭鸿斌表演相声  
(图片由李春熠提供)

李春熠

1993年生于天津,相声、快板演员。曾获北京市青年传统相声大赛二等奖、北京市快板书大赛一等奖、第一届“马季杯”全国大学生相声展演第一名。

晚,我现在要弄节目。去年我和郭鸿斌办了专场演出,后面可能还要做专场。还有一些相声剧,一些群口相声、化妆相声也都在准备。每周我们都会演一个不一样的节目,甚至一周会演到五个不常演的节目,其中有一两个是新创作的,直播时,也要提前想演什么新节目。”

他感觉自己一直是马不停蹄的状态:“每周三下午3点到4点,我们文工团也有一个固定的直播,也需要提前想想,有什么好玩儿的事情,可以展现出来。”他也会根据最近大家都关注的热点,写一些小快板,拍好了发在抖音上。

李春熠还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和中国矿业大学的校外曲艺指导老师。每到周末,他要去给同学们排练、上课,讲相声的基本原理、表演和创作方法。“我提出了一个设想——既然每个人都能说五分钟脱口秀,那么每个人也都能说五分钟相声。我教大家怎么去创作相声,怎么把生活当中有意思的事变成相声,用相声的语言呈现出来。”他说会继续在大学校园里深耕,“因为教学相长,虽说是给学生们上课,但也能跟他们学到很多新的流行语,了解更年轻一代的想法,能让自己跟上潮流。”

李春熠的妻子关英,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曲艺研究生,她也在听云轩说相声,也主持、报幕。“我们两口子在一块儿就是聊相声,特别有意思,我们把爱好变成了工作,真的非常开心。我们还养了一只猫,在家里头会给我们提供情绪价值。我们也喜欢跟观众朋友聊聊天,比如,最近我们这些节目您觉得怎么样啊?您想听什么样的节目?我们特别希望听到观众的反馈。”李春熠说。

有时间李春熠就回天津,最想干的事就是吃一套煎饼馃子,或者去吃马路砂锅。也会跟妻子一起去海河边,“尤其到了夏天,在海河边溜达溜达,觉得特别美好。”

李春熠口述  
师父曹云金  
教我说相声

认识曹云金老师后,我就开始去听云轩“下海”说相声。边听、边学、边演。因为自己特别喜欢曹老师的相声风格,时机成熟了,就拜了师。

之前我在天津学过一些,比较杂,业余范儿比较重,师父说,你需要“落挂”,也就是把以前会的东西忘掉,重新学。记得当时我每次演完了台,到休息室,师父便一句一句地给我讲我表演中的问题,讲每个包袱儿的原理,也告诉我如何举一反三去理解。

师父说,相声的语言不能重复,不能简单地鹦鹉学舌。比如,逗哏的说:“今天我给您说段相声。”如果捧哏的说:“对,今天我们给您说段相声。”这就是相声的语言。再举个例子,《对春联》里有一段内容,逗哏的说:“有一出戏叫《目莲救母》,您看过吗?”如果捧哏的说:“看过。”也能过得去,但捧哏的要显摆自己比逗哏的有学问,他说:“又叫《滑油山》。”那意思是我不光看过,我还知道这出戏讲的是什么内容。

师父给我讲完这个,我一下子领悟了。后来我在写节目的时候,两个人物要是互相攀比,台词也会用这个模板。我把自己的作品拿给师父看,他也会逐字逐句地告诉我,哪里需要什么技巧,哪里需要什么语气,哪里的包袱儿还不够。我都记下来,回家慢慢修改。

师父从来没有说给你哪里啰嗦讲半天,没有,就几个字,就告诉你:你要懂,你的悟性就够;你要不懂,那么你自己要去琢磨。不仅在艺术上,在生活中,师父对我也特别关心。我上大三那年,师父突发心脏病,进了重症监护室。我连夜赶回天津,师父告诉我:“一定要照顾好父亲,有什么困难,尽管说话,我肯定办到。”至今,逐字逐句,我记在心头。

还有一次,我们去演出,我穿了一条牛仔裤,裤腿长,显得特邋遢。师父看见了,走过来弯腰给我挽裤腿,“你出来得注意形象,这不好看。”我特别感动。我去央广录节目,穿的西服有点儿小。师父说:“你这西服不行,太小了显得特别窝囊,我那有几件,找我来拿,你改改去。”我现在上台演出时,还是穿他当时送给我的西服。

后来我也收了徒弟,叫吴梓潇。那是新冠疫情期间,师父的状态并不是那么好。吴梓潇在全国的快板邀请赛上拿了一等奖,我特别兴奋,把这个消息转发给师父,“师父,我徒弟拿一等奖了,您给看看。”师父说,“你的徒弟,你说。”我说:“别呀,这也是您的传人。”大概过了半天儿吧,晚上十二点,师父给我回了一句话:“咱俩以后也别师傅了,我也是海青,别影响你的发展。”我当时就哭了:“不行,您永远是我的榜样。”师父是一个特别善良的人,他特别怕自己影响了别人、耽误了别人。我这个人也轴,我说:“我就跟您学,因为我最难的时候,对相声最懵懂的时候,是您让我知道了相声是什么,让我知道相声的路该怎么走!”

我不再仅仅满足于书写自己。社区里,有些和我年纪相仿的老姐妹,一辈子围着灶台、田地、儿女打转,扁担能挑千斤重,自己的名字却写不出来。看到她们在需要签名时的窘迫,我仿佛看到了当年捏着铅笔发抖的自己。一个念头冒出来:“我能写,我也能教!”我把家里的客厅收拾出来,买了最便宜的本子和铅笔,一个小小的、没有名分的“姐妹识字班”开课了。

第一课,教大家写“人”字,我指着黑板(其实是一块旧木板):“看,这一撇,一捺,不像一个人,稳稳当地站在地上?咱们女人也得这样,站直了。”教大家写“家”字,我说:“有瓦遮头,有豕(猪)可养,是家;心里头踏实,有人惦记着冷暖,更是家!”

看着她们布满老茧、关节变形的手,紧紧握着铅笔,在纸上用力地写字,那份认真和专注让我眼眶发热。她们脸上绽放的笑容羞涩又自豪,让我觉得珍贵。这不仅仅是识字,这是帮她们找回被岁月磨蚀的尊严,帮她们推开一扇能看见更广阔世界的窗。每次上课,看着她们眼里的光一点点亮起来,我仿佛也汲取了新的力量,在帮助他人的过程中,找到了人生的意义。

姐妹识字班的课桌上,一位白发苍苍的姐姐,在练习本上写下她的名字。她抬起头,眼里闪烁着孩子般纯净的目光,望向站在一旁的我。那一刻,我仿佛看到当年那个因为写不好“春”字而瑟瑟发抖的自己。我拿起笔,在她名字的旁边,工工整整写下一个“春”字,“日”字稳稳地托着上面的三横一撇一捺,饱满而有力,像一轮初升的太阳,坚定地顶起了整个天空。它不再散架,不再颤抖,它是我从黑暗里亲手打磨出的光。

## 讲述

### 通过写作自我疗愈,也把温暖传递给他人

## 苦尽甘来遇见最好的自己

### 口述 阿包 撰文 王小柔

在北京见到了这位穿着苗族服装的女性,她笑着用并不标准的普通话讲述自己的故事——生在黔东南一个贫困的苗寨,“阿包”是她的苗族名字。虽然不怎么识字,但她出了一本《阿包》,这是她对着手机说话,转成文字,再逐一照抄下来写成的。她想告诉女儿和外孙女,也告诉大家,自己大半生到底经历了什么。

### 前半生历经坎坷 写出自己的故事

我出生在1968年,名字叫阿包。“包”在苗语里的意思是“路边不起眼却带刺的灌木”。我的前半生,似乎也一直在与坚硬的命运磕碰。童年时母亲去世,生活的担子沉甸甸地压上我的肩头。路过村小学,那琅琅读书声像钩子一样勾住了我。我想:不能这样下去!于是,天不亮我就钻进山坳采茶,手指被露水和茶叶染得发绿,背到镇上换回几张带着汗味儿的毛票,终于有了短暂坐在教室里的机会。识得的字,像在心底埋下了一粒种子。十几岁时,我出



阿包

对儿女的思念,关于生活的重量,关于那些努力活着的面孔……太多太多的东西堵在我胸口。

写作,谈何容易。字认得太少,普通话还带着浓重的乡音。女儿小菊教我用手机语音输入,可60秒的时长限制像“催命符”,常常话没说完就断掉,而且满屏都是错别字。我拿着铅笔,照着手机屏幕上的字,一笔一画,像小学生一样在本子上“画”字。

女儿小菊先是惊讶,然后红了眼眶,第二天就塞给我一部屏幕更大、更清晰的手机,还下载了好几个据说更“聪明”的语音软件。她又翻出一本《新华字典》,郑重地放在我手边。我学着查字典,遇到语音转写不出来的字,就按拼音去翻找。来自女儿的支持,是我最温暖也最坚实的依靠。写得慢,写得丑,写得歪歪扭扭,写得手指发酸,但每写出一个正确的字,我心里就踏实一分。

### 她讲故事的天分 在她的骨头缝里

每天给潘哥熬好药,世界才真正属于我。手机屏幕幽幽的光映照着我的脸。对着它说话,常常卡壳儿。

一个词在喉咙里打转,但就是找不到准确的读音。有时心里翻江倒海,涌到嘴边却只剩干巴巴的几句。挫败感像潮水一样袭来。潘哥听见我叹气,摸索着起身,默默倒一杯热水,放在我旁边,只说一句:“莫急,慢慢讲,讲出来就好。”

最难的是回忆那些离别与痛楚,对着手机讲起老伴儿老赵最后的日子,回忆他瘦削的脸,回忆他断断续续的话语,回忆他眼中那深深的歉疚和不舍……我的喉咙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扼住,只能哽咽,手机屏幕上的绿条无声地走着,记录下这破碎的、不成句的悲伤。等情绪稍稍平复,我深吸一口气,擦掉眼泪,重新按下录音键。不是为了展示伤口,而是为了把那份沉重的情感、那份在绝境中依然相互扶持的暖意释放出来。潘哥说得对:“写出来,痛才能散,心才能透亮。”

当厚厚的手稿终于送到出版社,编辑最初的反馈却是“太像流水账了”。潘哥一听就急了,据理力争:“改成文绉绉的调调儿